

欠发达地区农民社会心态分析

——以甘肃省武山县坪塬村为例

刘永明

(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兰州 730070)

提 要: 社会心态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折射出社会变迁中的价值观和心态的嬗变。欠发达地区农民心态受政治认同心态、公共环境心态、人情消费心态和休闲心态的影响,存在着表层心态平衡稳定、深层心态认知与情感不协调等问题,需要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赋权农民相结合,才能有效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心态向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关 键 词: 表层心态;深层心态;失衡;农民赋权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3)04-0069-04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心态一直是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心态”一词在17世纪开始出现于英国学术界,当时清教的价值观渗透进英国社会各个领域并以此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引起人们心理状态的重要变化,“社会心态”一词即用来表明当时的社会现象。19世纪中叶,法国年鉴学派所创立的心态史学将社会心态作为正式的研究领域确立下来,以社会心态表示一个时期普遍存在于法国社会中的主流习俗,以概括和反映法国的社会文化现象。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西方学者多把社会心态等同于一个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趋势或者精神状态,一般认为,社会心态研究真正开始于1918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对波兰移民文化适应的讨论。

社会心态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对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两个,其一认为“社会心态是某一社会时期社会群众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表现为人心民意或者社情民意,简单说就是指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意见、态度或情趣,因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阶层的不同产生差异。”^[1]其二认为“社会心态一般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者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社会共识、社会情趣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2]二是研究了社会心态的表现形式及其作用,其表现形式为知、情、意的心理结构,具有抗变、凝聚社会组织及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3]。三是有关社会心态的调节及调节目标的研究,认为社会心态具有“安全阀”的功能,对其调节可以宣泄社会不满情绪以缓和社会矛盾,优化社会心态以发挥其整体社会整合功能^[4]。四是对社会心态的历史变迁研究及现阶段中国社会心态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心态正由特殊主义转向普遍主义、由保守转向积极进取、由封闭内向转变为大胆开放^[5],国民的整体心态趋向积极乐观,不同群体的社会感受、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有较大差异^[6]。总体而言,目前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虽已初步展开,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区域性不平衡的背景下,用一种宏大叙事描绘、理解和统摄国民社会心态,往往显得不足,缺乏对特定群体的社会命运,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如何在剧变中艰难地调适繁复、多面、矛盾和歧异的社会心态的现实关切。本文试图揭示和解释欠发达地区农民在改变本土乡村的同时

自身心态的变化,以还原这一特定群体在社会大变革进程中的精神状态,为欠发达地区政府制定社会政策和确立社会服务方向提供重要参照。

二、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一) 案例介绍

调查案例坪塬村属于西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武山县的一个普通村庄。自然条件恶劣,坪塬村坐落在武山县渭河北岸海拔1365—3120米的黄土高坡上,地势多为崎岖不平的山地,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粮食作物和蔬菜。交通不便,该村距县城约15公里,一条简陋的乡村公路联结着该村与外界的交流,信息较为闭塞。总人口1695人,387户,主要为核心家庭。80年代末期,村庄内大量劳动力外流,流入地有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此该村进入了打工经济时代。部分留守农民和回流的农民工仍然以传统的种植业为生,经济成分单一,工业基础薄弱。随着打工收入的流回和耕作效率的提高,该村庄的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均年收入从1990年的578元增加到2011年的3235元。其中6户富裕户年人均收入1万元以上。农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刺激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也发生着巨变,过去落后的乡村文化和传统习惯渐次被摒弃。

本研究运用分层抽样方法,充分考虑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等相关因素选取研究对象,按10户的距离抽取调查对象共40位,男32名,女8名。调查对象的年龄集中在40—49岁之间,占52%;文化程度集中在小学阶段,占66%。总体而言,样本群体的特征为:男性多女性少、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低。本研究主要运用了访谈方法,资料经整理后以描述性统计进行分析。

(二) 分析框架

分析农民心态的向度,有论者从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入手,考察农民心态在不同方向上的实然状态及其关系,也有论者用理想类型范式研究农民心态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以揭示经济发展促成心态变迁的内在机制。本文认为,要考察某一社会共同体宏观的社会心境状态,离不开对发生在共同体内的具体经验事实的分析,因为“社会心态由制度与心理过程交叉形成,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应该成为心态的本质”^[7]。制

物化为一系列社会事件,农民在应对社会事件过程中形成的心理构成了社会心态的全部。因此,本文以现代工业社会心态的理想类型为标准,从欠发达地区农民对社会事件的认识、情感和行为倾向等方面分析其社会心态。本文所指的社会事件包括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国家方针政策的执行、村民自治、基础设施建设、人情往来活动和休闲活动等基本社会事实。

三、调查结果

(一) 政治认同心态

政治认同是人们的政治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个体只有在建立认同感的基础上,才能对一个政治组织或一种政治信念表现出最大的热忱和忠诚,有助于政治组织及其制度获得合法性,提高组织制度化程度,这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之一。本文政治认同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对国家政策的认知程度,二是政治参与行动。

1. 整体而言,农民对国家的发展态势较为乐观,较为认同党和政府的权威。就“关于国家最近出台的一些新农村政策,您了解多少”这一问题,82%的人认为,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是正确英明、切实可行的,近几年实施的农村建设政策,如税费改革、义务教育、粮食补贴等,减少了农民的负担。论及“国家政策的执行程度和对您真正得到的实惠有何体会”这一问题,85%的人认为,一系列重要的民生政策的落实,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在享受到国家政策的好处后能够安居乐业。近90%的人认为,基础教育政策增加了教育投资力度,免除学杂费解决了儿童上学经费困难的问题,使儿童不会单纯因家庭困难而辍学在家。人们对构建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信心,比如,72%的人认为,国家大力推广集雨节灌、塑料大棚和薄膜覆盖技术,出资兴建了集雨水窖、安装了自来水网管,落实了退耕还林补贴、粮食补贴以及良种补贴、农机购买补贴、购买家具补贴等政策,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农民切实体会到了政策的好处,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政策增强了人们自主创业、大力投资的勇气,普遍赞同创业致富。农民在各项政策的扶助下积极跟进国家发展的步伐,不甘落后。

2. 由于村庄是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单位,村庄的各项活动对农民的切身利益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村委会的选举、村民大会的召开应该争取具备资格的村民全体参与。问及“中央要求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政策的规定”的知晓情况,只有24%的人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过,48%的村民不清楚村里是否有村务公开栏或村务公开室,62%的村民对当前的村务不太清楚。询问“您对村民大会了解多少”,37%的人不清楚村民大会是什么,42%的人表示没有开过全体村民大会,59%的人认为会议的内容是传达中央文件,讨论村内大事,36%的村民认为开会无实质内容,走形式而已。继续追问“您对村干部如何换届选举的看法”,80%的人认为,“人都不认识,怎么选?还不是上边决定好的嘛,公家的事情,与我们无关,选谁都无所谓”,53%的人认为,现在村委会的班子经过“海选”产生,没有选举标准,至于其中的过程那就更不清楚,但也无人向上级反映情况。在谈到“对现行村委会工作的满意度”时,81%的农民认为村委会干部可以信任,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13%的农民认为村委会的工作不够扎实,看不出为农民干了多少实事,没有明显的

工作失误,但也没有创新的工作。

如上表明,村民们高度认同国家与政府的政策,企盼国家与政府给予恩惠,事实上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国家和政府之上,这种态度让农民在政治活动中不能自我代表。同时,公共事务决策具有隐蔽性,不让农民代表自己的利益,村级选举或管理自然不能满足农民各方面的利益,他们自然就不热心,也不在乎。据一位在本村工作过的社会工作者称“如果以总分10分算的话,干群关系可以打4分。”村民与村干部的互动多发生在签字盖章之类程序性活动内。因此,在一种习得性无助感的控制下,大多数农民政治观念淡薄,参与意识不强。

(二) 社区环境心态

村民赖以生存的社区环境直接影响其生活质量,进而影响人们的社会心态。本主题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对村里公共环境设施建设的认知及态度,二是对公共医疗供给的认知及态度。谈及“您对村里的环境设施建设有何看法”,72%的村民认为,村里水电供应问题解决到位,自来水免费,电费收支能够透明化,突然停水停电问题鲜有发生,即使出现了,也能够及时抢修,81%的人认为,便利的交通和发达的通讯方便了农村与外界的信息联系,为致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们也注重环保,不乱扔垃圾废物。近几年人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了,开始改善住房条件,花大价钱置办家具、翻修住房,富裕一些的村民在县城购置了楼房。人们的家庭设备及日用品趋于高档化,彩电、洗衣机、电风扇、煤气灶等也进入了农村家庭,村民们告别了“黑烟筒、土灶台、烟熏火燎烧干柴”的生活方式。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它的供给无疑给人们的健康上了一层保险。问及“您觉得目前农村的医疗状况如何”,78%的村民反映,纵向比较,无论是医疗设施还是医疗水平与服务态度都大大提升,医疗设备有更新,医务人员的素质有所提高,农民看病方便多了,22%的人认为,与城市相比,农村医疗条件落后,医务人员水平低,服务态度欠佳。该村85%的村民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统筹,看病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轻,但不报销门诊费用以及只能按较低比例补偿县级医院以上的住院费用的规定,使得病人自付医药费的比例依然很高,村民还是难以承受,无奈只能“小病拖,大病扛,实在不行躺在床”。

一条条措施、一个个项目在农村的落实,显著地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提升了村民对社区的信心和希望。但与村民实际需要相比,公共服务尚不能充分满足村民的基本需要。

(三) 人情与消费心态

中国社会历来重视人情,乡土社会更是如此。人情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也就是人们的相处之道。“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曾经有效地调节着乡村社会的人际互动,使得人们通过人情往来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的和谐社会秩序,有利于乡村社会的心态平和和社区的有机整合。坪塬村流行着“人情大如债,头顶锅盖卖”的传言。人情消费在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互相攀比,畸形消费严重。消费名目越来越多,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过去的人情多是逢年过节的亲情礼和友情礼,或者是红白喜事的表达性送礼,名目单一,但当下人情消费的名目日渐增多,问及“您如何看待人情往来”,62%的人认为,人情往来越来越普遍,生子贺喜、老年人祝寿、婚丧嫁娶、子女成年、子女升学或参军、求人办

事等重要事情都必须相互走动,大摆宴席收受礼金。人情消费的数额越来越大,过去送鸡蛋等农产品或5元、10元钱即可表达心意,现在送10元至100元不等的人民币也难表情达意。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礼金也在水涨船高,问到“您在人情往来方面的开销如何”时,72%的人认为其开销仅次于子女的教育费用,因为攀比花费争面子,现在的开销比过去要大很多,你现在送50元,往后我一定要还你100元,导致人们只能负债搞排场,人情开支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农村人情消费日渐变味,其真情表白的本意逐渐向工具理性手段演变,礼金越送越高,农民的物质负担越来越重,人情焦虑感加剧。

(四) 闲暇心态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凡伯伦认为闲暇是富裕后脱离贱役的生活财富,是相对于忙碌的一种生活方式。闲暇态度与闲暇方式反映出人们真实的精神状态,是社会心态的另一重要表征。人们通过闲暇来表达自我和体念自我,寻找快乐和生命意义,进而达致心态平和。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繁荣,村民不再密切依赖土地,闲暇时间由此增多。论及“对农村闲暇生活如何看待”,68%的村民认为,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好多了,有了空闲时间,生活方式和习惯也开始学习城市人,服装追求休闲、个性时尚、随意。37%的村民认为,农村人的这些打扮都是模仿那些外出务工人员。询问“休闲时会从事什么活动”,许多人都认为,喝酒、下馆子、打麻将、打牌等活动居多,搞竞技比赛或文化活动的较少,也没有人带头来组织,出钱出力的没有,人们也就随着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三五成群地消遣。有少数人也提到,赌博风愈刮愈盛,一部分农民在过年期间或者农闲期间会参加一些小型的赌博活动,这种风气不好,因此打架伤人的事时有发生。有的农民因此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不过去年以来,村里办过秧歌比赛、武术比赛,这些娱乐活动既能够锻炼身体,又能免除人们聚众招惹是非。69%的人认为,当地社会风气整体趋于上进。

四、农民社会心态结构的矛盾与失衡

社会心态是对社会生活的一般性认知和评价,依据社会心态模型,其平衡取决于社会情感、社会认知与社会行为三者的协调程度。其中,社会情感与社会认知两者间的一致程度直接决定社会心态的平衡与质量。在此,社会认知是指农民对社会生活的信念或认识,社会生活即上述基层的政治生活、社区环境和医疗保障措施,人情往来与休闲生活等,社会情感是农民对社会生活的积极或消极体念,社会行为特指行为倾向。如果社会认知与社会情感一致,则整体社会心态趋于平衡,反之,社会心态则会不平衡。社会认知与社会情感是否协调,取决于社会心态的层次。社会心态一般分为两个层级,表层心态和深层心态,表层心态与表层的观点、看法、意见相联系,深层心态与深层的价值观和信仰相联系,形成一个由表及里、从外到内的系统。

应该说,社会变迁促成了欠发达地区农民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性转变。与十年前贫困地区农民强烈的农本思想、安土避迁、固守家园、温饱即安、缺乏自信、害怕竞争、不思进取^[8]和缺乏科学知识、观念落后、认识和理解水平较低等特征相比较,欠发达地区农民逐步形成了开放、竞争与求实求稳共存的心态,但总体社会心态因内部诸因素不协调而存在矛盾和失衡之特征。

(一) 表层社会心态抽象层次高,表现出较高的社会赞许性和认受性

社会情感与社会认知在社会心态的表层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如上调查,在抽象层次上,农民对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有着客观的认识,他们认为无论是村容村貌,还是人们的精神面貌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迁。国家出台的新农村政策空前关注农民的利益,医疗保险制度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健康权利,社区服务有所完善,生活满意度总体有了大幅度提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农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等民主权力得以兑现。绝大多数农民参政议政热情较高,因为他们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只要符合条件,就可能被选为领导,充分满足主人翁的参政需要。农民开始主动关心国家政策及其变化,预测政策的调整等,把个人切身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国家安排的富民惠民政策,不管其执行效果如何,从总体上来讲,农民都是认同的。农民对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认同较高,对未来充满信心,能乐观积极地判断国家的发展态势。农民们一致感受到了国家和政府政策的润泽,人们对国家政策的认识与情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社会心态平衡。

(二) 深层社会心态表现出冲突与矛盾的特点

社会认知与社会情感在深层心态上表现出不一致性。在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实践层面上,农民表现出了极度的不满与猜疑,从情感上排斥基层的制度实践,总体心态不协调。政策上的政治民主参与并不意味着实践层面的真正民主,村里的选举活动是领导干部说了算,长期在村里当干部的人,“上面”一般都有后台,而干部的任免都由“上面”决定。有时也搞民主选举,但那只是走过场。相当一部分村民对参政议政、村民自治并不了解,群众言路不通,少数村干部一手遮天,群众提意见背地里被穿“小鞋”的风险,村民害怕某些村委班子会明目张胆地打击报复,并不参与村里的政事,“管他呢,谁当村主任,我还一样是农民。”形成了事不关己的漠然心态。公共服务的提供有限地满足了农民的需求,但离农民幸福健康生活的实际需要还有距离。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看病的负担,但医药费用的补偿比例低,住院费用报销只针对县级以上的医院,病人自负医药费的比例依然很高,农民仍然难以承受。农村医疗设施不全,医疗服务质量欠佳。农民对医疗环境的认同度低,情感消极,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安土重迁情结和封闭保守心态在逐步被打破的同时,相对剥夺感有所滋生。近年来,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务工,笔者所调查的40户农家中,每家至少有两人以上常年外出务工,“我们进城打工,并无太多的留恋和不能割舍的东西,也不像城里人害怕丢掉铁饭碗。随便干什么或怎么干都行,干的再不好还是农民,从古到今,还没有不让当农民的,所以思想包袱就不大,有提高经济效益的机会,就毫不犹豫地向前闯。愈是不怕丢掉什么,愈能发家致富,而愈能发家致富,愈是不怕丢掉什么”,显现出农民实现向上流动的渴望。这体现了农民思想解放、锐意进取的心态。但另一方面,农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普遍偏低,有较明显的自卑、压抑心态。尽管农村经济有所发展,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增加,农村仍然是落后和劳苦的代名词,农民依然处于社会最底层,农民是最辛苦又最挣不到钱的职业,其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低下。即使进城务工能够挣

得不少的薪水,但与城市其他群体的收入与处境相比,面临的生存风险仍然最大。年轻一代务工人员外出后,农村社区日渐凋零和荒芜,他们并不热爱农村生活,但城市生活的高昂成本,使得他们难于扎根城市,边缘人地位导致他们冲突的边际心理,他们既难融入城市又难接受纯粹农民的身份,对城乡差异心存不满,相对剥夺心理严重。

面子文化导致了人情认知与情感上的矛盾心理。乡土人情浓厚但人情消费呈异化趋势使得村民普遍认为人情重要,但又深感礼物的逐级加重带来的不堪重负。休闲娱乐时间增多但缺乏健康价值观的引导,村民休闲娱乐认知与情感并不协调。

五、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欠发达地区农民心态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有积极向好的一面,也存在消极负面的成分,具体表现为:

第一,欠发达地区农民社会心态在宏观抽象层面上高度平衡。农民高度认同国家的各项政策和制度,无论是国家的政治参与政策还是惠民政策(比如种粮直补、养老保险、残疾人、特困户保障等)教育政策,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抑或是基础设施建设措施,农民们都体会到了切实的好处,表现出平和的心态,这对于国家级贫困县的现代化进程整体推进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第二,欠发达地区农民社会心态在微观实践层面上存在矛盾与冲突。各项方针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因为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渠道不畅通,民意得不到合理表达,以及地方财政补充不足等限制,农民的需要尚不能充分满足。农民对社会事件的认知与情感相对割裂,呈现出不和谐的状态。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有效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民社会心态存在着表层心态平衡稳定、深层心态认知与情感不协调等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改善社会公共生活,以促成农民理性的社会认知。基层政府在提供有限资源时,增加一个村民需求视角,恢复村民主体角色,把村民拥有的各种形式的地方资本,比如,物质资源、社会资源及动员其有限资产捍卫其生计的能力纳入其中,开发和提升潜藏在农民身上的可利用资源。在各项涉农政策上广泛吸纳村民参与,加强他们的权力和自主性。当政府角色从制度提供者转变为促进者,农民作为受益人充分参与公共生活协商时,其社会认知必然趋于理性。其次,要培养农民的社区归宿意识和外出务工人员的回乡意识。调查中年纪较大的村民都有过外出务工的经历,在外务工的青年农民主观上也都有回乡意愿。回乡后应通过继续培训增强他们对乡村的自信心,主要是增强村庄内部事务的控制与管理能力,赋权农民。借助独立于国家与农民的第三方行动者,比如各类NGO组织和民间力量等的推动,以NGO组织代

替政府涉足服务供给领域以调解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敌意^[9],从根本上获得归宿社区的精神寄托,农民才能从情感上真诚地接纳基层政府的各项举措。最后,我们一方面要避免将欠发达地区农民心态与发达地区农民的观念形态作简单的类比,但另一方面,有必要认清社会心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正如英格尔斯所言,“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10],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区域间社会经济巨大差异的真正原因在于区域内部的人际交往心态以及与之相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11],因此,只有促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才能使之与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雅君. “无直接利益冲突”与社会心态调控[J]. 理论探讨, 2008(4): 161-164.
- [2] 杨宜音. 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 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 社会学研究, 2006(4).
- [3] 何静. 论社会心态的本质、表现形式及其作用[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4): 39-45.
- [4] 程家明. 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述评[J]. 学术研究, 2009(7): 36-41.
- [5] 周晓虹. 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268-283.
- [6] 王俊秀, 杨宜音. 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97-189.
- [7] Harvey A Farberman, Manheim, Cooley, and Mead: Towards a Social Theory of Mentalit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05.
- [8] 杨继平等. 特贫困农村地区文化发展滞后的社会心理成因调查分析[J].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1999(2): 60-64.
- [9] 安东尼·哈尔, 詹姆斯·梅志里. 发展型社会政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43.
- [10] 转引自英格尔斯. 人的现代化[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4.
- [11] 李友梅. 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5: 146-14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部农民信息需求特征及农村信息服务调查与研究”(11XTQ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永明(1971—),女,硕士,四川仪陇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工作研究。

责任编辑: 王旭东; 校对: 圣方